

新马华社早期的女子教育

郑良树

吴怀疚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在上海创设务本女学,为中国人自己捐资兴建女校之始。虽然如此,中国的女子教育却要在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才开始露出曙光,而女子教育正式列入教育制度,却要迟至光绪三十三年(1907)。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庚子之役后,清廷于创深痛钜之余,有感于教育之不振,于是,乃准许国人创设女校;然而,次年清政府初订教育制度时,在张百熙奏定的学堂章程中,只字不提女子教育,可见女子教育依然毫无地位可言。到了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张百熙与张之洞、荣庆修订学堂章程,始于《蒙养院章程》及《家庭教育章程》中言及;然而,根据《章程》条文来看,女子教育也只是附属于蒙养及家庭教育之内,^①其宗旨不外传统的相夫教子一途而已,缺乏自己独立的目标和体制。

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(1907)三月八日,清廷颁布〈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〉及〈女子小学章程二十条〉,^②中国女子教育才正式列入教育制

郑良树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。

① 《蒙养院章程》第十节：“三代以来，女子亦皆有教，备见经典。所谓教者，教以为女、为妇、为母之道也。”见舒新城编，《近代中国教育史料》（中华书局，1993），第二册第十一章，页165-168。

② 丁致聘编，《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》（国立编译馆，1935），光绪三十三年。

度，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之一环。这个时候，女子小学教育才正式具体化——有学制、有课程、有目标、有宗旨。尽管这个时候的女子教育只有小学、师范学堂，不设中学，更遑论大学；尽管这个时候的女子教育必须和男子教育完全分开，并且小学、师范修学年限都比男子教育少一年，然而，视过去的情形，不能不说是大有进步了。

新马华社女子教育始于何时呢？根据目前所能考见的资料来判断，本区华社最早的女子学校应该是新加坡的华侨女校。此校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比清廷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教育体系，并且将女子教育完全具体化还要早两年；而其创办人及主持人却是位广东女性黄典娴。^③黄典娴，就是当年闻名本区的黄亚福的爱女。^④关于这位女强人，梁绍文赞誉她为“南洋之女豪杰”，并且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：

……客到齐了，将要入座了，我的朋友指着一位四十来岁——不高不矮，身材合度，时式装束，衣裙朴而不华，头梳飞云压耳髻，脸上现出慈祥而秀丽，端正而温和的颜色，笑靥迎人，如一阵春风拂面而过——的中年妇人，对我介绍说：“这位是黄典娴先生，是华侨女学的校长，在社会上办事最热心的人……。”……华侨女

③ 许苏吾说：“光绪三十一年间，康有为等南下，鼓励华侨创设学堂，各帮纷纷响应，设立新式男子学堂。当时，有一粤侨闺秀黄典娴女士，亦于同年间，创办华侨女校，专授中文，为华侨女子教育之先河。”见许著《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》（新加坡：南洋书局，1950），页46。

④ 黄亚福，广东台山人，道光十年（1837）生于乡间。少年抵新加坡，从事各种杂役，克俭起家。其后，获识柔佛苏丹阿武巴加（Sultan Abu Bakar），承建市内各项土木工程，包括苏丹皇宫等，富逾千万，乃于新、柔二地广置地产，并于1903年在新加坡创设广益银行，为华侨自设银行之嚆矢。生平见 Song Ong Siang, *One Hundred Years'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*（宋旺相，《新加坡华人百年史》）（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4），pp. 354-355；以及关楚璞主编，《星洲十年》（1939），第五编第三章〈先贤传略〉，页1037-8。黄典娴，为黄亚福元配所生。

学，在星架坡创立最早，当时华侨风气未开，所有女子，仍然是土耳其式的女子，半步不出闺门，所以学生寥寥无几人。黄典娴为创办人而兼校长，不特无半点灰心，而筹划进行，改良方案，事事躬亲力行。果然风气渐开，学校林立，从前之“孤立无声援”的，现在“随处皆附义之师”了。来学者众，房舍不敷，又再扩张，如是者已三次，其成绩之优美可想。

黄典娴生长在旧式家庭，其父又为富逾千万的资本家；自少只受过古典式的教育，所有的时髦学问，作梦都未曾见过。若依“娇生惯养”的习惯来讲，她最多做一个安份享福的太太，那还能够受许多冤枉的苦恼，听许多无谓的闲言闲语？但是她却不然。不特没有一点资本家习气，并且一点太太的骄逸样子都没有。她最特别的是：善于交际，而绝非上海式的滑头敷衍，无处不令人感动她的真诚信义；长于处事，而绝非官僚式的做此忘彼，事事总负完全责任。凡事不应允则已，倘她允诺了，必念念不忘，虽出生入死，亦必完成此事，方肯放心。她平日最大量，凡有所求，必不令人失望，但绝不表露骄矜之色，不特无施恩望报之念，连言语亦不稍提。她身子很弱的样子，但做起事来非常胆大而有勇气。平日绝不多言，只知力行做事，故在南洋不论新的旧的，老的少的，提起“黄典娴”三字，无人不竖起大姆指说：“她是南洋第一个好人！”

每早八点钟，华侨女学校的门口必有一辆汽车驶来；每天下午四点钟，必有一辆汽车驶去；点钟从没有差。……十年来总是一样，就这一点看，可见黄典娴齐一而有恒久的精神，真是什么人都赶不上。每逢有大会，必见着一个中年的妇女，端坐一隅，见人说话，定着神，很留心的样子听着，无论开会的时间长短，必竖其腰，昂其首，直至毕会而后已。但有一事，在大会中从未闻此人发过言！在别人想，以为止管听而不讲的人，必定不热心，或是木讷不善于言辞的，才在大会里不会发言。谁知这个不会发言的人，正是最热心而能实行议案的人。^⑤

根据这段文字，我们可以得知这位黄女士是非常热心于女子教育的，她不但是一位勇于负责，能够身体力行的教育家，而且是一位有远见、有计划，能够为群伦表率的女强人。为了本区女子教育，她放下娇生惯养的富贵生活，抛头露面地到处奔走，孤军奋战，独自苦撑，终于激起阵阵的回响，校舍扩建后又扩建，学生增加后又增加，赢得“第一好人”之誉，也以其木讷、果敢及负责的行动为本区华族女子教育打开局面，成为本区享誉甚隆的首位女教育家。有关这间女校的学制、课程及其他情形，我们一无所知，无法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清廷公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相比较，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^⑤

为什么新马华族女子教育会发轫得那么早？如果华侨女校创设于1905年的话，则比清廷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早两年；如果像许苏吾另一材料所说的，创于1907年，那么，就和清廷颁布章程同一年了；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，新马华族女子小学教育可以追溯得那么早，对新马华社来说，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然而，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早产生女子小学呢？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颇值得我们思索。

远在19世纪初叶，新加坡已经拥有女子教育了。1837年新加坡书院（Singapore Institution）成立时，院中就有女子班，为各族女童提供小学程度的教育。其后，新加坡书院小学部发展为莱佛士男校，女子班即发展为莱佛士女校。19世纪中叶，一些教会团体已经在本区推动女子教育了。比如伦敦传道会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于1853年已在新加坡创设中华女子学堂（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），后易名为 St. Margarets' Girls School，由 Sophia Cooke 主持，^⑥ 学生有20名；这是一所为华族女童提供英语课程的小型学校，可以说是本区最早的一所女子英文学校。1866年，法国海外传教会创办圣约翰学校，又创设姑娘堂学校。美以美教会的成绩更惊

⑤ 梁绍文，《南洋旅行漫记》（上海：中华书局，1924），页53-55。

⑥ 许苏吾谓此女校设在陆佑街，创于民国六年（1917）；创设年代与自己前一说自相矛盾，未知孰是。见许著《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》（见注③），页165。

⑦ 宋旺相，《新加坡华人百年史》（见注④），页86。

人，1887年创办 Anglo-Tamil Girls School，1888年创设 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，1895年创设 Methodist Girls School。檳城的情形也类似如此，据说，19世纪30年代那儿就有一间以读《圣经》为主的女校，^⑧相信也是教会办的。再以东马来说，美以美教会1903年派遣富雅各教士（Rev. James M. Hoover）在诗巫创办女校，其后发展为毓英女校。^⑨像这些女校，除了特别指定招收个别民族之外，大部分女校的学生恐怕还是以华族为主。

因此，远在清廷提出女子教育的概念前，新马华社早已知道女子教育这回事了。一些有远见的知识份子在受到这些教会的影响之下，当然早已了解到女子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。黄典嫻创办及主理华侨女校，更适当的说法应该是在海外受了这股风气的影响，了解女性在家庭及社会所扮演的积极角色，所以才从教会创办女校那儿得到启发和灵感，开风气之先为华社作出卓越的贡献。

黄亚福的长子黄景棠，即黄典嫻的兄长，可能也是华侨女校兴办的影响者。景棠十三岁被送回中国内地念书，及长，对国学甚有研究，又工诗文，时与岭南诗人名士唱和，尤热心于教育，在广州创办时敏学堂、述善善堂及坤维女学校等。^⑩因此，黄典嫻创办华侨女校，有可能是取法其兄长的坤维女校，也可能是兄长的想法很早就传给了典嫻，使她后来也有此心愿，并且加以实践。总而言之，黄典嫻创办女校，受本地教会的启发，也受兄长的激励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
黄典嫻既受本地风气激荡而成为华社新式女子教育的第一人，首开大旗，张扬在先；其后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清廷落实女子教育的学科、学制及宗旨等，女子教育卒完全具体化，成为有章程条规可遵循、可实行的方案；于是，本区女子教育乃如雨后春笋般地，四处创设兴办，成为一个全民的运

⑧ 王秀南，〈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〉，在王著《星马教育研究集》内（香港：东南亚研究所，1974），页3。

⑨ 刘子政，《黄乃棠与新福州》（新加坡：南洋学会，1979），第十章〈新福州垦场的教育〉，页38-41。

⑩ 关楚璞编，《星洲十年》（见注④），页1038。

动。一直到日本南侵为止，新马华社一方面全面创办男子学校，一方面也浸浴在兴办女子教育的热潮中。

这里，根据地区及时代先后对新马华社经营女子教育的情况加以描绘：

■ 新加坡

1. **中华女校** 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而创办，发起人为郑聘庭牧师、潘兆鹏及孙先生，1911年成立，^①校址在竹脚（Mount Emily Road）。
2. **崇福女学校** 创办于1915年4月，在实登里街。1930年春，由福建会馆接办。
3. **崇本女学校** 1916年元月创办于亚里哇街。原名育德女校，1917年改为今名，与崇正学校同一董事部。
4. **侨英女校** 1916年创设于荷罗卫巷，战后停办。
5. **南华女学校** 养正学校于1915年春增设女子部，招收女生。旋因事停办，一批热心教育者乃于1917年6月创设本校，承接该部之工作。
6. **嫫嬛女校** 1922年创设于大坡尼律，战后停办。
7. **大德女校** 1923年创设于乞例达街，战后停办。
8. **坤成女校** 1924年创设于乞例达街，战后停办。
9. **群英女校** 1926年创设于庙仔街，战后停办。
10. **街馀女校** 1927年创设于恭锡街，战后停办。
11. **静方女学校** 1928年，原本养正学校兼设女生部，格于当地教育条例，男校不准招收12岁以上之女生，为避免养正女生半途停学，并嘉勉有志求学者负笈不辍，于是另组女子专校，是为该校创置之缘由。校址在大坡尼律，战后停办。
12. **志钊女校** 1928年创设于恭锡街，战后停办。
13. **圣尼古拉女校** 1933年创设于域多利亞街。
14. **圣婴女校** 1934年创设于后港七里半。

^① 郑健庐谓中华女校创办于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与此不同；见郑著《南洋三月记》（上海：中华书局，1935），页32。

15. **辅女学校** 1934年创设于大马路。
16. **义安女校** 1940年创设于里巴巴里律，由义安公司独立维持。1967年开始兼收男生，其后易名义安小学。

■ 槟城

1. **璧如女校** 创设于1912年。梁碧如身后捐10万元，^⑫又谢梦池(1847-1912)遗嘱捐10万元，^⑬乃得以办成，为槟城最早的新式女校。
2. **务内女校** 由吴德志(1862-1919)于1915年所创设。^⑭吴氏于1906年在同善堂内增设学堂，即同善学校之前身。吴氏，盖热心教育者。
3. **中华女校** 于1916年由杨汉翔及梁金盏等所创设，二人皆槟城阅书报社社员。^⑮
4. **福建女校** 陈新政及林福全等于1920年所创设，是槟城最大的女校。其后分3校：第一校在打石街，有8级；第二校在中路，有16级；第三校在加拉歪路，有6级。
5. **协和学校** 于1928年创办于车水路。^⑯
6. **毓南女校**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。

⑫ 邝国祥，〈清末驻槟领事之流风遗泽〉，《南洋文摘》6卷6期（1966年6月21日）（新加坡：世界书局），页32-33。

⑬ 郑永美，〈平章先贤列传〉，《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》，页169-193。另一材料谓该校乃“梁恩权、德权为纪念先父梁碧如而创办，”创办年为1915；见嘉联会资料小组编写，〈声教南暨——嘉应先贤早期的兴学史〉，原载于《嘉联会讯》2期（1991年6月），又转载于《雪隆嘉应会馆八十七周年纪念特刊》（1992）。

⑭ 郑永美，〈平章先贤列传〉（见注⑬），页173。

⑮ 许生理，〈槟城阅书报社五十九年来概述〉，《南洋文摘》8卷1期（1968年2月），页59-61。

⑯ 见〈校史〉，刊于《槟城协和女子中学校暨幼稚园三十周年纪念刊》（1958），页5-6。余与魏维贤合编之《马新华文中学特刊提要（附校史）》亦录有该文，页136-138。

7. 南洋女子公学 创设年代不详，黄回澜曾担任其董事。^⑰
8. 华侨女校 设置年代不详，林启裕曾担任其总理；郑健庐于1933年考察槟城时，已知有此校，^⑱可知设置时代至迟在20年代。
9. 辅友女学校 该校乃槟城辅友社社友于1931年7月应华文视学官之请，从中国幼稚园接办而设置，原址在柑仔园，后不敷应用，乃迁至油较路辅友社右邻，自置一所。

■ 马六甲

1. 培德女校 该校与培风学校同时创办于1913年，属姐妹学校。初期学生稀少，几乎难以续办，其后得刘韵琴掌校，始解逆境。1917年5月，正式成立校董会，校址移往丰顺义学处，^⑲为马六甲最早的一间新式女校。
2. 四维女校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。

■ 柔佛

1. 麻坡化南女校 1918年麻坡中华学校女生渐多，为管理上之方便，并多容纳女生，乃于是年10月分办本校，专收女生及幼年男生，校址在三马路民房内，为麻坡最早新式女校。^⑳两姐妹学校后合并为中化。
2. 巴株巴辖爱群女校 创设于1923年4月27日。
3. 居銮中华女校 创设于1926年，为居銮最早的新式女校；1937年增办初中，开居銮华校中等教育之先河。^㉑战后，与华侨学校、培英学校合并，成为今日之中华中学。

⑰ 郑永美，〈平章先贤列传〉（见注⑬），页174。

⑱ 同上。

⑲ 见〈校史〉，刊于《培风五十年金禧纪念特刊》。

⑳ 见〈校史〉，刊于《中化中小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》（1962）。

㉑ 见〈校史〉，刊于《居銮中华中小学四十五周年特刊》。

■ 雪兰莪、吉隆坡

1. 坤成学校 清廷于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，该校即于次年（1908）创设于吉隆坡甘光亚答民房处，^{②②}与尊孔为姐妹学校。^{②③}
2. 吉隆坡中华女学校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。
3. 巴生中华女校 创设年代不详。郑健庐于1933年曾往参观，校长为长沙人武元章，校舍设在一双层楼之商店内。有教员4人，学生百名，分高初小学4课室。^{②④}
4. 吉隆坡精武女校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。
5. 坤维女校 创设年代不详。梁绍文《漫记》中载吉隆坡有此女校，校长为湖南人，朱姓。^{②⑤}

■ 吡叻

1. 怡保勤业女校 创办于1916年，校址未详。
2. 金宝俊修女校 创办于1918年。^{②⑥}
3. 吡叻女子学校 吡叻有女子中学，开办于1918年。该校即女子中学之附属学校，创办于1933年，设在坝罗古庙（即大伯公庙）内。本名为怡保公立女学校，创办时高初小学生3百余人，教室8间。^{②⑦}
4. 公立安顺女校 1911年，安顺侨贤发起创办安顺华侨公立学校。当时囿于地域观念，广闽二帮子弟分别在广东古庙侧及福顺宫前戏台二处上课，学生百余人。1914年春，乃分为二校，属于广帮者仍名“华侨”，属于福帮者则易名为“培华”。1916年春，为适应环境之需，又增设中

②② 见〈校史〉，利于《坤成女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》。

②③ 郑健庐说：“坤成女学校……与尊孔同一董事部者。”见郑著《南洋三月记》（见注①），页85。

②④ 同上，页88。

②⑤ 见梁著《南洋旅行漫记》（见注⑤），页135-6。

②⑥ 以上二校，俱见《南洋年鉴》，页癸86。

②⑦ 同注②③，页103。

华学校。三校虽男女兼收，然家长传统观念太深，多不愿送女生就读，以故女生特少。1926年春，林采仁等鉴于女子教育的重要，乃倡议创办公立安顺女校，得全埠米油商热烈支持，乃假培智书报社开学。1928年国难之故，四校乃合并，成为安顺三民男女两学校。一直到1935年止，男女二校虽由同一董事会统辖，惟校务行政各自独立。1935年后，乃合并为一校。

■ 森美兰

1. 芙蓉坤华女校 创办于1917年。^⑳

■ 吉打

1. 亚罗士打中华女校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。

以上所胪列的，是在此全民办学热潮的时期内在市区所创办的女子学校。在审览这些女校之余，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。

第一、女校皆集中于城市

绝大部分女校都设置于市区内或大城市中，郊区以及小乡镇都不见有女校。以新加坡为例，绝大部分女校都设在市区内，郊区如巴丝班让、裕廊、武吉知玛等，根本就没有女校，与男校普遍设置的情形完全不同；以柔佛为例，只有麻坡、峇株巴辖、居銮这些比较大的城市才有女校，其他乡镇如古来、拉央拉央、亚逸依淡等也根本没女校。这种情形其实很容易解释，主要原因是郊区及乡镇地区民风比较保守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，所以，女校办不起来；反过来说，市区内或城市中人心比较开放，女子教育比较被认可，所以，才有许多女校的设置。

^⑳ 同注^⑳。

第二、女校传统的维持

五四运动以后，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旧思想已被打破，于是，男女合校普遍流行，而且影响海外华社。从前文勾勒的简单校史中，可知许多女校后来就与其姐妹学校的男校合并起来，例如麻坡的化南、居銮的中华以及吡叻的安顺。然而，有一些女校却被维持下来，即不兼收男生，也不与其相关的男校合并，例如新加坡的南洋、吉隆坡的坤成以及吡叻的女子。这种情形的合理解释可能是华社民风基本上依然纯朴，打破传统的意愿不够强；另一方面，也可能是人心安于故习，不愿意改弦更张，合并或兼收。

第三、女校兴办的衰落

根据上述材料来观察，大部分的女校都创办于30年代以前，只有极少数几间创办于30年代；至于战后女校的设置，更是寥若晨星。另一方面，许多女校战后都停办了；比如新加坡的嫫嫫、大德、群英等等。这种现象也很容易解释，因为男女合校风气已开，女生和男生一起上课，何必单独创设女校呢？过去的女校，战后又何必复办呢？

虽然各地女校纷纷冒起，然而，在这个风气尚未大开、民情纯朴的时代里，兴办女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试读梁绍文有关培德女校的情形：

那所培德女学，更是令人灰心！办了好几年，总是几个学生，弄得有神无气的样儿，办也不是，不办也不是，因为许多华侨都是从宋明时代就到了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的子孙还是守着宋明时代的旧礼教，“男子治外，女子治内，外言不入于闾，内言不出于闾”这些礼俗，一点也不肯舍掉。……培德的董事，觉得如此这般的接续办下去，实在有些不愿意；倘若将它停止了，眼看只有这个硕果仅存的女学，尚不能维持，又觉有些可惜！后来终归聘了一位刘韵琴女士当校长，逐渐地改良，时常到女生家长面前，联络他们的感情，使他们知道女子受教育的好处，开迪他们的风气，居然从几个

学生加到几十，又从几十加到一百几十，于是培德女学从此蒸蒸日上，一年进步一年了。^{②⑨}

风气初开，民情还不够开放，是创办女校的最大障碍；像培德这样的情形，要不是遇到一位女强人担任校长，最后恐怕会停办。最不幸的是连创办人都没有信心，或者是没有把握聘得教师。邝国祥曾记述过槟城的情形：

至民国前一年，所设立的学校，如中华、同善、新江、林氏、广福、时中、商务等校，皆属男校，女校则尚付缺如（惟胡子春先生在清末，曾在本城倡办中华女校，旋以教师难请停办）。直至民国元年，武汉纪念日，本城平章会馆诸商董，在会馆召开创办女学会议，拟命名为武昌女学，谋女界的教育，作实在的纪念。谁知到会的不上十人，以人数太少，不能成议而散……^{③⑩}

中华女校因为教员难觅而停办，武昌女学因为创办者没信心而胎死腹中；像这样的情形，相信其他地区也曾发生过，是华裔先贤们曾经备尝过的苦果。

另一方面，女校常为是非所在之处，易生事端，进而引起社会骚动，所以，女校的创办和维持都比较困难。梁绍文曾记录吉隆坡坤维女校的一件风潮——一无父母的女学生承受不住女校长的虐待，竟上吊自杀，幸命不该绝，被救活过来。消息披露之后，报章一连两个多月，天天刊登批评及攻击性的文字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最后校长辞职离开，女学生才重返校园。^{③⑪}此事虽然错在校长，然而，却也可以看出女校乃一脆弱之地，易生是非，维持起来颇为不易。

就在这种种障碍及困难之下，先贤披荆斩棘创办了一间又一间的女校，和同时代兴办的无数男校构成华教的双璧，辉映在我们华族的历史洪流里，永垂不朽。

^{②⑨} 同注^{②⑤}，页152-3。

^{③⑩} 邝国祥，《槟城散记》（新加坡：世界书局，1958），页138-9。

^{③⑪} 同注^{②⑤}，页134-5。